

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黄群慧

[摘要] 有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问题又是政府努力解决的重大经济结构问题。然而,有关什么是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包括的范围,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并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实体经济分类的分层框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_0)是制造业,这是实体经济核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_1)包括 R_0 、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这是经济体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_2)包括 R_1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这是经济体的整体内容,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 R_2 和金融业、房地产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也就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构成的整体经济。基于这个分类框架,本文测算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的增长情况,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且地位不断加强。但是,实体经济发展也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在 R_0 上表现为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在 R_1 上表现为服务业和工业发展的失衡,在 R_2 上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基于对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了未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一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二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关键词]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分类; 结构失衡; 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7)09-0005-20

一、引言

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就专门提出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牢牢把

[收稿日期] 2017-08-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制造 2025’的技术路径、产业选择与战略规划研究”(批准号15ZDB149)。

[作者简介] 黄群慧(1966—),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huang.q.h@263.net。

* 本文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7)总论部分,发表时略有删节。

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12)。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2017)。2017年7月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真实服务实体经济。

在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下,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实体经济财富和生产供给能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①,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黄群慧,2016)。但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大而不强”问题突出,虽然具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供给数量,但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大国而非实体经济强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基本国情。无论是强调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要回归本源真实服务实体经济,还是将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以及通过创新驱动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本质上都是基于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基本国情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和政策导向。尤其是,在经济增速趋缓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不仅仅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自身发展问题,而且是中国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这意味着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结构失衡,这包括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结构失衡,以及实体经济外部的实体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而应对结构失衡的良方就是结构性改革。因此,推进以创新为核心要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实现实体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根本路径,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

二、关于实体经济的基本认识与分类框架

虽然在经济战略和政策领域以及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实体经济”一词被反复使用,但从理论层

^① 关于中国所处工业化阶段存在的不同观点。近些年大多数文献都认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工业化中后期是一个很漫长的阶段,且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具有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中后期的判断对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来制定发展战略的意义不大。笔者连续多年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跟踪评价表明,2011年以后,中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和李芳芳等,2017)。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也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特征相吻合,这也支持了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判断。这一判断也越来越被研究文献和政府部门所接受,国家统计局也已经采用了这一判断(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1_1505616.html)。但是,最近也有研究认为,中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胡鞍钢,2017),该研究存在对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指标的一些错误理解,其结论并不利于科学判断中国国情和进一步制定到2050年的现代化战略。

面对实体经济予以严格界定并不容易,甚至在从实证角度分析实体经济所包括的内容或者范围时,往往不同的实证研究侧重也不同,而且从统计意义上看并没有实体经济这样一个专门的针对性指标。从现有的文献看,大致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界定实体经济,一个是与虚拟经济辨析的角度,另一个是产业分类视角。前者侧重于经济史和理论层面的分析,而后者可用于支撑实证统计分析。

从经济学说史角度看,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因此,界定实体经济需要基于对虚拟经济的理解来论述。马克思较早地在资本范围内讨论了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分类,认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8),并揭示了虚拟资本随着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发展而实现自我增值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分别从实际经济运行和货币运行、工业和金融、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应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类。值得提及的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将整个经济体系分为实体经济(Real Economy)和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实体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的流通,符号经济是指资本的运动、外汇率和信用流通。用符号经济替代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①或者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被认为更具有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匹配性以及更能解释二者的本质联系(张晓晶,2002)。

但是,当今多数研究者和社会上更倾向于使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应。实际上,真正界定实体经济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多是研究虚拟经济和经济泡沫问题,只是从对应和辨析角度界定实体经济。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相关文献出现得更为集中。在具体表述什么是实体经济时,不同表述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核心都是如何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至少存在两种区分,一种是从定价方式出发的“宽虚拟、窄实体”分类。这种区分认为虚拟经济是以理念或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指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二者的区分标准不是以行业差异或以发生在实物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差异,而是资产定价行为方式的差异。这样,虚拟经济的范畴既包括金融、房地产等产业,也包括无形资产、某些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等,以及其他可能长期或短期进入这种特殊运行方式的有形产品和劳务(成思危和刘骏民,2003)。另外一种是从功能角度出发的“宽实体、窄虚拟”分类。这种区分认为实体经济是指由生产服务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其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生存发展资料、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和增强人类综合素质;相对而言,虚拟经济则是金融部门主导的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发挥货币的清算与支付结算、资本融通与资源配置、经营风险管理、信息提供与激励等功能达到“以钱生钱”。^②因此,判断是否是实体经济的关键标准在于是否具有直接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改善了生存发展质量的功能。两种区分界定方式相比而言,前者出发点是虚拟经济而且倾向于经济理论性,而后者出发点是实体经济且更适合实证和现实需要。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与实体经济对应的“虚拟经济”是与金融等相关的“虚拟”(Fictitious),而不是与网络相关的“虚拟”(Virtual)。与网络相关的“虚拟”对应的是“物理”,应该是“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概念对应。最近有些制造业企业家借着社会上呼吁避免“脱实向虚”、强调给实体经济发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机会,批评电子商务的发展侵害了实体经济。姑且不论是否存在这种侵害,这个问题是不能归结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否则就是混淆了两种“虚拟”的概念。

② 关于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问题有五职能、六职能等不同的归类,一般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金融功能的支付结算、储蓄与投资等最基本职能,但是正确利用金融体系,还会有促进分工、有助于风险管理、改善资源配置、发挥信息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激励机制等功能(李扬,2017;何德旭和王朝阳,2017)。

无论如何界定,要理解实体经济发展,必须回归到产业视角上来。基于上述“宽实体、窄虚拟”的区分,从产业层面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第三产业中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产业也都应属于实体经济。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看,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户、零售销售等被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但是,仅仅停留在三次产业层面理解实体经济是不够的,界定实体经济还需要进一步按具体产业归属划分。现在人们在讨论实体经济问题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例如当前讨论有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虚实脱离”等问题时,虽然都是用“实体经济”这一个概念,但其所指的涵义、包括的具体产业往往不同,这会导致看法大相径庭。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业属于服务业,而服务业又归为实体经济,因而金融业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存在“脱实向虚”问题都是伪命题。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全面正确理解实体经济,必须从更为具体的产业层面来界定和划分实体经济的层次。对应于货币层次的分类形式,本文提出了实体经济的三层次分类框架,如图 1 所示。^①

第一层次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可以用 R_0 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 R_0 、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其他工业,可以用 R_1 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 R_1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可以用 R_2 表示,这是实体的整体内容,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 R_2 和金融业、房地产业就构成了国民经济整体,也就是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整个国民经济。

			制造业
		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	实体经济 (R_0)
	除了金融和房地产业以外的服务业	实体经济 (R_1)	
金融和房地产业	实体经济 (R_2)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国民经济			

图 1 产业视角的实体经济分类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 R_0 层次的实体经济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制造业的“制成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存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从提供人类生存发展资料、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和增强人类综合素质的实体经济功能看,制造业成为毋庸置疑的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逐步深度融合,第一、二、三次产业界限日趋模糊,信息化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在加剧, R_0 叠加了更多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内涵。 R_0 自身正经历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变革。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个性化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智能制造成为 R_0 转型升级制高点。在智能制造驱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推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社会经济领域的智能化发展。信息化社会下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真正的驱动力量还是来自于 R_0 的发展,因此,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并没有改变,只是呈现出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的趋势(黄群慧,2017a)。

从 R_0 层次实体经济结构看,实体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 R_0 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关系。 R_0 内部结构是指制造业内部各行业关系, R_0 外部结构是指 R_0 和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行业关系,主要是工业

^① 应指出的是,这里将实体经济划分为 R_0 、 R_1 、 R_2 三个层次,与货币三个层次 M_0 、 M_1 、 M_2 有形式对应性,但内容上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然而,下文的分析表明,这并不影响实体经济三个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产业结构关系^①。R₀ 内外结构动态变化表明了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问题,从供需角度也反映了制造业、工业的供给体系质量和供需结构变化问题。在 R₀ 层面,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增加,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不断转型、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最终表现为制造复杂产品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随着工业化阶段推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向资金密集型产业主导进而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变化,也正表明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也意味着对于不同国家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产业结构水平不同,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也就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要不断提升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近年来,随着对美国金融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由制造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能力是能够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最好的指标(Hausmann et al., 2013),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即 R₀ 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

2. R₁ 层次的实体经济

这个层次的实体经济主要包括制造业(R₀)、农业、建筑业和其他所有工业,这是传统意义上“实体性”生产的主体部门,也是对应经济学中生产性劳动的部门。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的,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的”(亚当·斯密,2014)。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对应“实体性物品”的实体经济。实际上,现实中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所谓实体经济就是 R₁ 层次的。正是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分类的基础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观点,足以支持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的结论。生产性劳动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更多的是以非生产性劳动为基础,虽然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经济服务化水平提升,制造业占比逐步降低,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增大,但生产性劳动和实体经济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仍不可替代(何玉长,2006)。如果仅仅将实体经济停留在 R₀ 和 R₁ 层次上,不会得出金融业也是实体经济的结论,因为在 R₀ 和 R₁ 层次上服务业是被界定到实体经济之外的。

当讨论 R₁ 结构问题时,如果将实体经济分为 R₁ 内部结构和 R₁ 外部结构,就会涉及实体经济与服务的关系。R₁ 内部结构就是上述 R₀ 层面的外部结构,主要是工业产业结构(含工业与农业、建筑业的结构),其关键问题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级化的问题;R₁ 外部结构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问题。由于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业,除了农业和工业以外,所有其他产业都被放在服务业这个“筐”中,服务业中各个行业的特性差异巨大,这就造成 R₁ 外部结构的纷繁复杂性。服务业存在各种不同的分类,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等,但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研究视角看,可以将服务业分为金融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两类。关于金融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结构关系是 R₂ 层次要讨论的。这里 R₁ 外部结构需要关注的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R₁ 外部结构呈现出 R₁ 占比逐步减小、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的演进过程,这一般被认为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也被认为是经济服务化的趋势。这种 R₁ 占比下降的实体经济结构演进规律,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不可逆的过程。但是,基于 Baumol(1967)的“非平衡增长模型”,这个过程中,由于实体经济 R₁ 的生产率高于服务业部门,随着实体经济 R₁ 占比下降、服务业部门占比上升,会出现整体经济减速,即所谓的结构性减速,存在“效率—结构—速

^① 考虑到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主要依赖现代生物技术、制造技术和农业机械等工业发展,这里在讨论 R₀ 层面的实体经济结构时不再单独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结构关系。

度”传导机制,而且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传导因素是,因服务业效率提升相对缓慢而产生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的“成本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R_1 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并不意味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一是由于实体经济生产的“迂回生产”的特性,本属于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出大都被统计为服务业了,因此,统计意义上,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比一般达70%—80%。二是从最终消费角度划分,服务消费和实体性产品消费是“50%—50%”结构,也就是 R_1 和服务经济各占50%的比例(詹森,2013)。Baumol(2001)也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的真实产值和所占比重并没有上涨或下降,长期而言服务业的需求与工业需求同步,其需求价格弹性几乎为零,不会随价格变化而变化。三是以制造业为核心、工农建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环节,实体经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短期经济增长和就业上,更重要的是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

3. R_2 层次的实体经济

这是广义的实体经济层面,具体包括: R_0 、 R_1 的实体经济,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教育、文化、政府等现代服务业,也就是 R_0 、 R_1 以及除了金融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服务业。这种划分实质上是一种排除法,也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中除了金融房地产业以外的都可以归结为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是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大主题,这种分类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二者间的关系。之所以把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归在一起,没有算作实体经济,不仅仅是因为当今房地产主要呈现的是金融衍生品的特征,还因为房地产的实体经济部分已经在建筑业中体现了,是 R_1 的组成部分。

R_2 层次的实体经济结构问题也可以划分为 R_2 内部结构和 R_2 外部结构,其内部结构也就是上述 R_1 外部结构,主要涉及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其外部结构也就是整体国民经济的结构,整体国民经济结构表现为 R_2 和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关系,也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一对关系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是错综复杂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的地位和意义,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经济泡沫和经济危机产生的机理。关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地位和意义,以实体经济为本,这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本质上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是由于金融资本跨越时空的资源配置节省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实体经济效率而获得的收益,因此,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本。但问题是,虽然都认可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但为什么实体经济常常会偏离虚拟经济,并逐渐产生金融泡沫,且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一种基本的解释是,如果将经济活动分为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信息流的帮助下,资金流可以脱离物流并快于物流单独流动,也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这意味着相对于实体经济交易而言,虚拟经济本身是可以单独进行交易的,其交易不仅比实体经济更具有流动性,而且还可以是跨越时空的。虚拟经济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快速流动性,决定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必然滞后于虚拟经济,从而虚拟经济运行脱离实体经济运行成为常态。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又加快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流动性,加深了这种脱离的程度。从投资的角度看,支持虚拟经济的金融资本运行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实业资本运行从短期看是可以分离的,金融资本会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循环,如果金融资本独立循环获得的投资回报高于投入实体经济的实业资本的回报,将会有更多的实体资本被“挤出”从而转向金融资本,这种“挤出效应”会随着金融投资回报率率的增加而增强,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储蓄—投资”转化、平衡机制内涵将发生变化(陈雨露和马勇,2012),进一步导致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步遭受挑战。只要实业资本回报率低于金融资本回报率,从理论上讲,不仅新增投资都逐步转向金融资本,而且原有实业资本也会设法逐步退出并转向金融资本,在资本资源既定的前提下,这意味着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将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加速衰减为代价。实体经济的萎缩又会进一步拉大实体经济回报和虚拟经济回报的差距,金融部门和金融交易就越发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来脱离真实的经济条件,虚拟经济泡沫也就越来越大,金融部门就会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一旦预期到现实经济条件和实体经济长期回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资本过度膨胀,金融危机就产生了。可以形象地说,当直接“以钱生钱”的金融资金流完全脱离了直接“以物生钱”的物流和实体资金流、完全陷入自我循环时,经济泡沫就会越来越大;由于直接“以钱生钱”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旦基于现实成本和技术实体经济“以物生钱”速度无法支撑这种快速膨胀的虚拟经济直接“以钱生钱”的欲望时,金融危机也就随之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脱离进行破坏性的纠正,说明经济发展本质上还是由实体经济是否发展决定的。因此,需要把握的是,一方面要认识到并允许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这种常态,但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黄群慧,2016)。在“虚实脱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导向,而政策的关键是如何根据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运行状况决定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动态调控虚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促进金融创新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

对实体经济三个层面的分类,不仅反映出对实体经济从狭义、一般到广义,由核心、主体到全体的递进的基本内涵,而且所直接对应的产业也符合统计年鉴的产业分类目录,易于进行实证研究。更有意义的是,对应 R_0 、 R_1 和 R_2 三个层面的实体经济结构能够引出制造业内部产业关系、工业与服务业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这三个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当前经济新常态下,这三对关系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亟待正确处理的问题。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 21 世纪初,中国就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以后中国就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但 2013—201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2%,仍远高于同期世界 2.5% 和发展中经济体 4% 的平均增长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计算,2016 年中国 GDP 为 11.2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 14.9%,比 2012 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①。基于上述关于实体经济的分类,实体经济 R_0 、 R_1 和 R_2 三个层面的增长情况如表 1 所示。2012—2016 年,虽然实体经济呈现出增速趋缓的趋势,但 R_0 最低增速也达 6.8%, R_1 增速保持在 5.8% 以上, R_2 增速在 6.4% 以上。到 2016 年, R_0 总量已经达到 22.4 万亿元, R_1 总量达到 36.1 万亿元, R_2 总量更是达到了 63.4 万亿元;实体产品生产能力如表 2 所示,中国主要工农产品产量一直都位列世界前茅,其中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等工业品和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等农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2012—2016 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由 9.8 万公里增加到 12.4 万公里,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由不到 1 万公里增加到 2.2 万公里以上,中国公路里程由

^①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司.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二(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1_1505616.html)。

424万公里增加到47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由9.6万公里增加到13.1万公里,这些指标都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甚至超过第2—10位国家的总和;2013—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10.4%提高到2016年的11.5%^①。所有这些指标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加强。正是在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地位的有力支撑下,中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层面实体经济的增长情况

年份	实体经济 R ₀		实体经济 R ₁		实体经济 R ₂	
	增加值(亿元)	增速(%)	增加值(亿元)	增速(%)	增加值(亿元)	增速(%)
2012	169806.6	8.5	275083.6	7.7	431218.1	7.9
2013	181867.8	10.5	295329.9	7.4	462971.1	7.4
2014	195620.3	9.4	315550.0	6.9	498426.8	7.7
2015	209313.7	7.0	333890.4	5.8	530500.1	6.4
2016	223547.0	6.8	361053.0		633862.0	

注:表中2012—2015年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数据和R₀的增加值为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摘要》(2017)、历年统计公报、Wind资讯数据计算。

表 2 2012—2015年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

产品	2012		2013		2014		2015	
	产量(万吨)	位次	产量(万吨)	位次	产量(万吨)	位次	产量(万吨)	位次
谷物	53935	1	55269	1	55741	1	57228	1
肉类	8387	1	8535	1	8707	1	8625	1
花生	1669	1	1697	1	1648	1	1644	1
油菜籽	1401	2	1446	2	1477	2	1493	2
甘蔗	12311	3	12820	3	12561	3	11697	3
茶叶	179	1	192	1	210	1	225	1
粗钢	72388	1	81314	1	82231	1	80383	1
煤	394513	1	397432	1	387400	1	374700	1
原油	20571	4	20992	4	21143	4	21456	4
发电量(亿千瓦)	50210	1	54316	1	56496	1	58146	1
水泥	220984	1	241924	1	249207	1	235919	1
化肥	6832	1	7026	1	6877	1	7432	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司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际司.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二,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1_1505616.html)整理。

第一,从R₀层面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实体经济世界第一大国,党的“十八大”以后积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努力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从大向强的转变。

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排名列世界第九位,到2000年该项占比上升到6.0%、居世界第四位,2007年该占比达到13.2%、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上升为18.6%,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到2013年该占比达到23.9%,迄今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制造业发展,从实体经济三个层次增长的速度看,如表1所示,虽

^①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理念引领新常态,新实践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16_1504091.html)。

然实体经济增速总体逐年放缓,但制造业增速仍是最快的,这几年实体经济增速呈现出 $R_0 > R_2 \geq R_1$ 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全面深入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增速大幅回落,到2016年,钢铁退出产能6500万吨以上,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2013—2016年,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其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9.4%和11.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1.9和3.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0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低0.2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8.1%,比2012年下降1.5个百分点^①。“十二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产生了探月“嫦娥”、入海“蛟龙”、新一代中国标准动车组、“天河二号”、国产大飞机C919、首艘国产航母、“天宫一号”等一批重大的科技成果,其中“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已连续四次蝉联世界超算排行榜冠军。另外,百万千瓦级核电装备国产化率提升至85%以上,一系列大型成套电力装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高精度数控齿轮磨床等产品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最值得提及的是,2015年5月19日,中国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制造强国建设的10年行动纲领,也意味着中国开始全面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提出制造强国战略是基于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世界工业化趋势和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制造2025》的“1+X”规划体系全部完成,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从提出部署转入到全面实施的新阶段(黄群慧,2017b)。

第二,从 R_1 层面看,中国实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工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能源发展呈现新格局,农业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一是从工业发展看,2016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4.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3%。在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情况下,这一比重仍远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资产分别为115万亿元、6.9万亿元和107万亿元,2013—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资产总计年均分别增长5.9%、5.3%和8.8%^②。具体从工业三大门类结构看,2013—2016年,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4%、4.5%、2.7%和下降1.0%,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9.4%、7.0%和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3.2%、1.4%和5.5%。2012—2016年,采矿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低4.4个百分点,2016年采矿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已下降到7.2%,比2012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结构总体呈现从资源和资金密集主导向技

①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新动能引领结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五(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04_1509628.html)。

②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新动能引领结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五(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04_1509628.html)。

术密集主导转型升级的趋势。二是从能源业发展看,能源生产和消费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能源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清洁低碳化进程加快。在一次能源生产构成中,2012—2016年,原煤占比从76.2%下降到69.6%,下降了6.6个百分点;原油占比从8.5%下降到8.2%,下降了0.3个百分点;天然气占比从4.1%上升到5.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从11.2%上升到16.9%,提高了5.7个百分点。同时,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单位GDP能耗显著下降,201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17.9%,节约和少用能源8.6亿吨标准煤^①。三是从农业发展看,农业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主产区稳产增产。2016年粮食主产区产量9355亿斤,比2012年增长2.4%;全国油料、蔬菜、水果和茶叶产量分别比2012年增长5.6%、12.6%、17.9%和34.1%。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快速涌现,2016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总数超过1270万人^②。四是从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看,2015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境内等级公路里程(全市)达379万公里,比2012年末增加28.5万公里,年均增长2.6%;境内高速公路里程(全市)达10.8万公里,增加2.0万公里,年均增长7.1%。网络设施迅速发展,4G网络和宽带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增长迅速,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电信业务收入(全市)13348亿元,比2012年增长22.1%,地级以上城市互联网用户数达25510万户,比2012年增长28.9%^③。2016年农村地区有99.7%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公路、通电和通电话,分别比2013年提高1.4、0.5和1.1个百分点;有97.1%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有线电视,比2013年提高7.9个百分点^④。

第三,从 R_2 层面看,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大幅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化后期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日趋明显,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服务业现价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2年的45.3%迅速提升至2016年的51.6%,提高6.3个百分点,2013—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8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012年的35.9%上升到2016年的43.5%,上升7.4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迅速普及,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加速,新业态层出不穷,电子商务规模持续扩大,分享经济蓬勃兴起。2016年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26.1万亿元,是2013年的2.5倍,年均增长36.4%。2013—2016年,互联网分享平台所属的规模以上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8.4%。分享经济渗透到交通、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等多个服务业领域和细分市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其中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名义增长13.7%^⑤。

①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能源司. 能源发展呈现新格局,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八(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07_1510973.html)。

②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农业司. 农业农村发展再上新台阶,基础活力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三(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2_1506090.html)。

③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九(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11_1511794.html)。

④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七(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06_1510401.html)。

⑤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 服务业擎起半壁江山,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十五(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25_1516453.html)。

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中,科技服务业发展迅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总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量为1.5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2.5%,年均增长11.1%;按汇率折算,在研发经费总量上中国2013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1%,比2012年提高0.2个百分点,目前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从科技产出看,2016年中国境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119.3万件,比2012年增长128.1%,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6.1件,比2012年增加25.4件。2016年境内发明专利授权29.5万件,比2012年增长115.3%。2016年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43168件,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三位。截至2016年末,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10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8.0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6年的25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第一位^①。

四、中国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

在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取得新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客观分析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升。基于上述实体经济三层次分类框架,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 R_0 内部结构——制造业行业关系、 R_1 外部结构——工业和服务业关系、 R_2 外部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等三方面。

1. R_0 结构问题: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是当前 R_0 层次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 R_0 供给结构的突出矛盾,主要体现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失衡。具体可以从 R_0 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三个方面分析。

(1)从 R_0 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中国制造业中,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在制造业中,传统资源加工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还比较高,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还比较低。虽然近些年高技术产业增速远远高于整体工业增速,但2016年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这六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只有12.4%,还不到六大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的1/2;主要制造行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较低。例如,近十年来,中国机电产品的平均出口单价只有19.75美元/公斤,远低于日本的39.74美元/公斤。另外,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中国22个制造业行业中,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的行业达到12个,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居高端的行业只有3个(张慧明和蔡银寅,2015);产业融合能力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产业技术能力看,“工业四基”能力还有待提升,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档芯片、精密检测仪器等高端产品依赖进口,2015年芯片进

^①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 科技发展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加力提速——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十九(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27_1517417.html)。

口额高达 2307 亿美元,是原油进口额的 1.7 倍。

(2)从 R_0 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业还很少。虽然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规模指标看,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 年全球财富 500 强”名单,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 115 家,仅次于美国,但是排名靠前的制造业企业很少,而且中国制造企业更多的是规模指标占优,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从资产收益率、企业利润和人均利润等指标看中国上榜制造企业还与欧美国家的世界 500 强存在明显差距。中国还缺少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者称“卓越企业”)。另外,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僵尸企业”,其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已不具有自生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市场出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中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属于社会包袱重、人员下岗分流难度大、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一份基于 2011—2015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显示,从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 38 家上市公司中随机选取了 17 家上市公司,其中僵尸企业 8 家、僵尸性企业 6 家、非僵尸企业 3 家(张栋等,2016)。“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恶化市场竞争秩序,极大地降低企业整体素质,影响了制造业供给质量。

(3)从 R_0 产品结构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2015 年国家监督抽查了 191 种 25345 批次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 91.1%,其中 30 种产品抽查合格率不足 80%。2016 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3152 家企业,抽查其生产的产品共计 23851 批次,抽查合格率为 91.6%,较 2015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但比 2014 年降低了 0.7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 2016 年世界品牌 500 强名单,中国入选品牌 36 个,仅占 7%,而美国则占据其中的 227 席。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 Interbrand 发布的 2016 年度“全球最具价值 100 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有 2 席。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表明,当工业化进入后期时,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加之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极大地带动了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主导的阶段逐步结束,消费者从追求“从无到有”转向“从有到好”,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为主流。一方面城市化带动的消费需求转型升级迅速,另一方面工业化后期面临 R_0 供给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瓶颈,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短期内无法适应消费需求转型升级的需要,于是产生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如果将供给质量理解为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那么,上述 R_0 结构性供需失衡正是说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和体系的质量亟待提升。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①。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 R_0 供给质量、努力实现 R_0 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也就成为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

必须高度重视 R_0 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旦国内 R_0 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变化,必然会有大量的消费力量转移到国外,会进一步影响国内 R_0 发展、加剧 R_0 供求结构失

^① “供给质量”这个用语在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存在,这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是区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观点的一个重要表述,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衡,进一步引致 R_0 回报率下降。实体企业面对国内投入回报降低以及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日益提高的国内运营成本,就会有一些企业逐步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加大。对于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存在上述由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失衡引起的效率损失,这可以认为是从工业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到城市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效率鸿沟”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而要跨越这个“效率鸿沟”、避免经济危机,并非易事。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失衡,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大意义(黄群慧,2017c)。

2. R_1 结构问题: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结构失衡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也一直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如图2所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6年的8.6%,第二产业占比从1978年的47.7%下降到2016年的39.8%,而第三产业占比则从1978年的24.6%上升到2016年的51.6%。整体上看,第一产业除少数年份外,改革开放以来总体逐年下降,近10年降幅有所收窄;第二产业占比一直是最大的,总体占比相对稳定,但2011年以后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总体逐年上升,2011年以后快速上升,2012年与第二产业持平,2013年成为最大占比产业,2015年则超过了GDP的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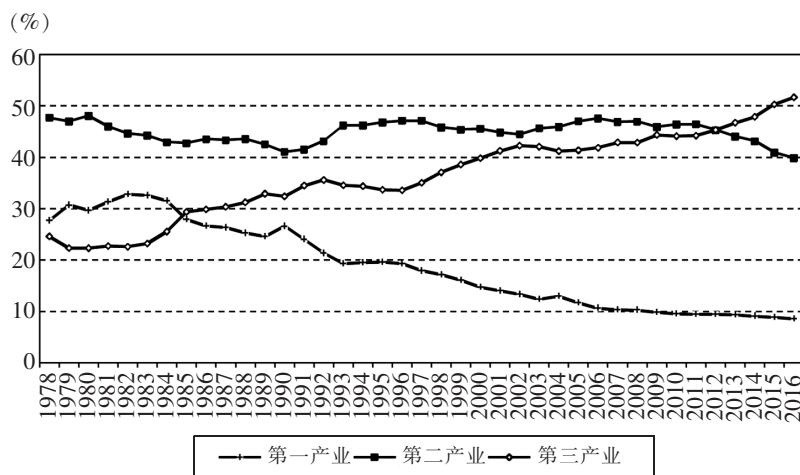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

关于中国服务业占比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失衡”观点:一种观点以标准经济结构理论为基础,认为现有中国服务业占比远低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占比水平(江静,2017),存在服务业占比过低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过于依赖出口导向而导致内外经济失衡(杨恩艳和马光荣,2016)。应该说,近年来这种“中国服务业比例低的结构失衡观”占据主流地位,从而产生了所谓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产业政策,目标是努力提高服务业占比,改善结构失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比不是太低,而是服务业提升太快,存在着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伴随着制造业比例的过快下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观”的基本政策含义是,

中国在未发展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之前,不宜简单追求提高服务业比例(郭凯明等,2017)。

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分析,本文更认同“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观”:^①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应该说,服务业占比快速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同样,世界上也少有如此速度的结构变迁。英国经济学家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而同期土地稀缺OECD国家、其他东亚国家、印度、其他南亚国家、土地富足OECD国家、前苏联组成国、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次撒哈拉非洲、世界平均、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变动分别为10.6%、7.5%、14.1%、9.1%、7.0%、18.0%、12.5%、-0.3%、1.9%、6.0%和7.0%,中国是服务业占比增速最快的。^②虽然存在“随着工业化水平提升,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但对于一国而言,一定GDP水平下服务业占比多少为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谓“产业结构标准型式”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占比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而且,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业占比提升实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便中国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也不能成为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原因。如果人为通过产业政策的干预来提高服务业比例,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强产业政策驱动下中国服务业占比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速反而明显下降。^③对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具有两方面缺陷(华民,2017):一是服务业资本深化程度不够,占比过快增长会使全社会人均资本降低,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近些年,服务业占比提升而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减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二是服务业发展由于知识专用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占比过快增长不利于经济的包容可持续增长。因此,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并非“善事”。^④中国服务业占比迅速上升是与 R_1 层次实体经济占比快速下降“共生”的,“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著加大。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可以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经济服务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级化的进程在加快,但这种过快上升还反映了服务业对实体经济升级支撑不够的问题。2011—2016年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而工业年均下降1.1个百分点。2016年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2016年全年工业投资总额231826亿元,增长3.5%,增速比2015年减少4.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增长4.2%,比2015年全年下降3.9个百分点,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为-6.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为116.7%。在当前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大力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工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国外投资大幅增长,无疑是“制造业空心化”的一种重要信号。^⑤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宋健和郑江淮,2017),服务业占比过快提高与其低效率不相匹配,产业结构呈现“逆库兹涅茨化”趋势。由于中国服务业高端化不够,服务业效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效率。从劳动生产率指标看,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2.36万元/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0.48万元/人,而且中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总体小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

综上所述,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为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变化,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整体效率提升的结构变化,那么,上述分析表

明,服务业占比迅速提升,只是表明了中国产业结构迅速“转型”,但整体经济效率未得到有效提升、产业结构未能够实现有效“升级”,也就是说,在 R_1 层次实体经济结构表明,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中国要高度重视这种失衡带来的效率损失和风险。

3. R_2 结构问题: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

表3计算了2011—2016年 R_0 、 R_1 和 R_2 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例情况,以及虚拟经济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一方面,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 R_1 下降最快,2011—2016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下降影响到6.6个百分点),实体经济的核心 R_0 占比也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整体层次的实体经济 R_2 下降了2.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2016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占比提高了2.1个百分点。而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占比都达到8.4%,这个比例不仅超过了中国2001—200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平均值4.0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这个比例的两个高点,即2001年的7.7%和2006年的7.6%,这两个高点对应的是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结合表1所示,对近些年实体经济增长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失衡,虚拟经济增长过快,而实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支持上述判断的另外的指标是 M_2 与GDP的比例,2011—2015年该比例逐年增加,从1.74增长到2.02,远超美国的0.69,也高于日本的1.74(何德旭和王朝阳,2017);2016年这个比例继续上升到2.08,总额已经达到155万亿元。虽然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但实体经济仍感到融资难,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发行,实体经济增速仍在不断下降,表明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严重。

表3 2012—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占比变化比较 单位:%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R_0 /GDP	R_1 /GDP	R_2 /GDP	金融业/GDP	房地产业/GDP	虚拟经济/GDP
2011	31.9	56.0	87.9	6.3	5.8	12.1
2012	31.4	55.2	87.7	6.5	5.8	12.3
2013	30.6	53.9	87.1	6.9	6.0	12.9
2014	30.4	52.6	86.9	7.2	5.9	13.1
2015	30.4	50.3	85.6	8.4	6.0	14.4
2016	30.0	48.6	85.1	8.4	6.5	14.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摘要》(2017)、历年统计公报、Wind资讯数据计算。

虽然近年来政策层面不断强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金融高速增长、实体经济趋缓的“实虚失衡”呢?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图3上、下两部分分别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条运行线路勾画出经济“脱实向虚”的基本逻辑,梳理了三层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关系。

首先看实体经济演进逻辑线路。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增长新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时期,其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深化互动发展的结果。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升的经济变量驱动下,城市化进程推进消费实现快速转型升级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但由于体制机制、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本等原因,服务业快速发展没有支撑起工业创新能力的相应提升,存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 R_1 的结构失衡,造成制造业大而不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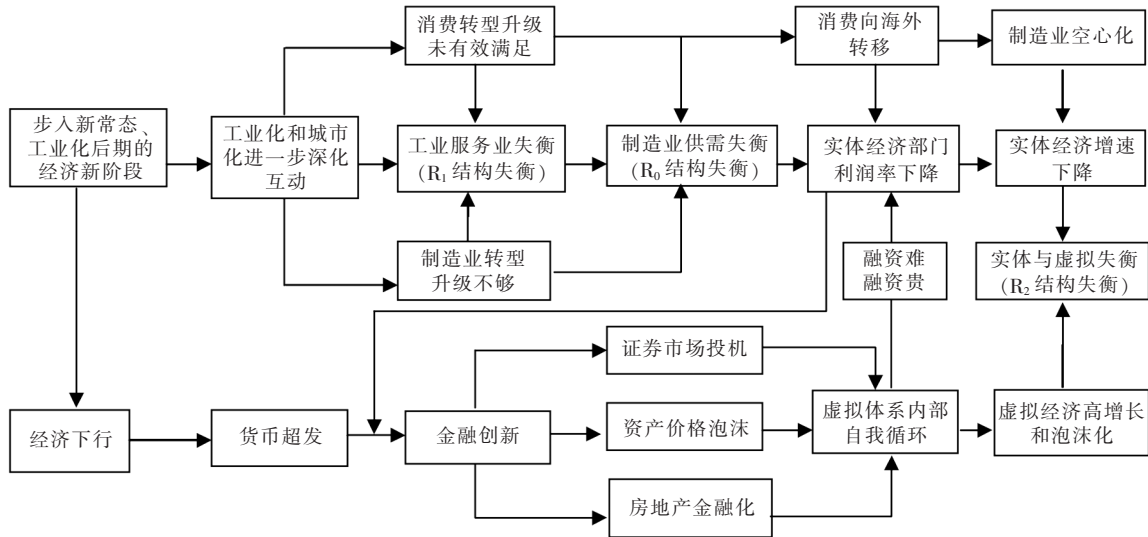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脱实向虚”的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的供给体系不能迅速升级,制造业供给质量不能满足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原有供求动态平衡被打破和新的供求平衡短期无法形成,制造业出现结构性供需失衡——实体经济 R_0 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会使得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回报大幅降低,实体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国内供需关系无法有效实现,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消费需求转向海外,国内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加速,同时国内实体经济经营环境不能相应改善,这一切又加剧了实体经济部门收益和投资的下降,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抑制。

接下来看虚拟经济演进逻辑线路。工业化后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面临下行的巨大压力,在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思想指导下,通过货币宽松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宽松遇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金融系统试图通过影子银行、延长信用链等金融创新手段寻求快速的高回报。与实体经济部门面临日益强化的约束相比,金融部门通过金融创新创造的货币供给不断增加,这两年每年都以 12%—13% 的速度增长;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穆迪估算,中国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达 65 万亿元,比 5 年前增加了近 2 倍(张军,2017),而方正证券估计,包括银行非传统信贷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业务和其他融资类业务在内的广义影子银行的规模从 2010 年的 15.45 万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95.94 万亿元。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这将促使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加剧证券市场投机和房地产市场金融化,资金在虚拟经济体系内部不断自我循环扩张,金融衍生和信用链条不断延伸,这又使得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进一步使实体经济投资回报降低和生存发展环境恶化,而虚拟经济在自我循环中走向泡沫化,表现为高速增长。然而,实体经济增速下降和虚拟经济高速增长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 R_2 结构失衡。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经济“脱实向虚”或者“实虚失衡”能够机制化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趋势和虚拟经济依靠资产价格泡沫收益不断上升的极大反差。从 2011—2016 年上市公司分行业净资产收益率看,制造业从 12.20% 下降到 9.78%,采矿业从 16.04% 下降到 2.41%,建筑业从 13.51% 下降到 11.38%,批发和零售业从 13.77% 下降到 7.85%,住宿和餐饮业从 8.94% 下降到 6.04%,而银行业利润占整个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自 2010 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30%,高点是 2012 年的 35.20%,低点是 2016 年的 26.54%(何德旭和王朝阳,2017)。据总体测算,近年来中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 6% 左右,而证券、银行业平均利润率则在 30% 左右(董涛,2017)。2016—2017 年上半年,制造

业上市公司“卖房保壳”的案例已屡见不鲜,这成为实体经济处境艰难和房地产狂欢盛宴的一个个鲜明写照。实际上,与“实虚失衡”关键机制相关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环境因素,包括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复杂的社会交易成本、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期有效稳定机制缺乏、房地产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等等,都是在主观和客观上强化虚拟和实体经济回报存在极大反差这个“实虚失衡”的关键机制。

五、未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1. 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

这具体可以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入手(黄群慧,2017d)。一是产品层面,以提高制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产品质量为基本目标,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技术创新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制造产品的供给质量。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整合资源、持续创新、承担风险,提高产品档次和产品附加值关键是依靠企业家精神实现技术创新并承担创新风险。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工匠精神是制造业质量和信誉的保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是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保证。一方面,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等能够激励企业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制造业创新发展上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进一步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心致志。二是企业层面,以提高企业素质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各类所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围绕降低实体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三是产业层面,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从政策着力点看,一方面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2. 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正发生巨大变化,产业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正在重构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在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和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巨大变革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和作用正由过去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向承载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和决定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转变,产业结构从“工业占比过大”的失衡状态转向“服务业过快增长”的失衡状态,中国经济增长正需要新的产业供给体系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①在三次产业日趋融合的大趋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目標不应该只是

追求统计意义上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应更加重视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更加重视培育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公平竞争环境。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造成整体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也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无论是提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未来中国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这个“牛鼻子”。②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的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关键任务是要构建这种新型现代产业体系,而这种产业新体系的构建无疑是要依赖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产业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无论是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提升,还是解决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都要依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但是,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效率(伍晓鹰,2017),即使是创新活动本身,也要关注创新的效率,构建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一定要以效率为导向。③当前中国服务业高度不够、效率不高已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效率,而且影响工业创新发展能力。而制约中国科技、教育、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升的关键是体制机制问题。科技、教育等事业单位体制以及市场化机制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有效使用,而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又极大地加重了实体经济的生存、创新发展的成本。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3. 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迄今为止,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正面和负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危机前,大多数研究认为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危机后,金融活动与其说向实体经济传达了价值不如说从实体经济抽取租金的观点占据上风(汤铎铎和张莹,2017)。近些年,中国工业6%左右的利润率而银行业利润占增加值30%的巨大反差,也从一方面证实了后者。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等未来5年工作总基调,这无疑为未来实体经济发展、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奠定了很好的政策方向基础。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从体制机制上深化改革,彻底打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实向虚”的自增强机制。实际上,要想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去化解金融业高收益对实体经济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以及房地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创新的“破坏效应”是十分困难的。从金融业看,这些年金融业高收益以及从业人员的高报酬已经集聚大量的高素质和高关系人力资本的人才,这些人才具备很强的金融创新能力,但其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不同,金融创新的方向大多是逃避监管、获取更多交易机会、使金融体系日趋复杂化,加之这些人才具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这种背景下实现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绝非易事。从房地产业看,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突破人们心理底线,这对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和整体发展已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2015—2016年这波房地产价格暴涨迄今并没有谁为其负责,虽然2017年3月以来一系列的计划手段控制了房价上涨,但在7、8月房价略有下行趋势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已经开始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为新

一轮暴涨做理论准备和心理预期引导,“租售同权”、“共有产权”等长效机制能否打破房地产价格“暴涨—调控—再暴涨”的循环神话还无法确定,房地产价格作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高高悬挂。因此,当务之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壮士断腕”的改革中,金融房地产业会面临着短期的阵痛,切勿以防控制金融领域风险为由而影响改革的进程。从风险管理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风险而言,金融领域风险虽然更为直接,对社会稳定短期影响更为剧烈,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经济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货币供给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参考文献]

- [1]阿德里安·伍德. 世界各国结构转型差异(1985—2015):模式、原因和寓意[J]. 经济科学, 2017,(1):5-31.
- [2]陈雨露,马勇. 泡沫、实体经济与金融危机:一个周期分析框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2,(1):1-19.
- [3]成思危,刘骏民. 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4]董涛. 如何遏制资金“脱实向虚”[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7):89-92.
- [5]郭凯明,航静,颜色.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17,(3):32-46.
- [6]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 [7]何德旭,王朝阳. 中国金融业高速增长:成因与风险[J]. 财贸经济, 2017,(7):16-32.
- [8]何玉长. 善待生产性劳动和优先实体经济[J]. 学术月刊, 2016,(9):73-82.
- [9]胡鞍钢. 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17,(1):1-16.
- [10]华民.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J]. 探索与争鸣, 2017,(5):118-122.
- [11]黄群慧. 打牢实体经济的根基[J]. 求是, 2016,(4):31-33.
- [12]黄群慧. 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新阶段[N]. 经济日报, 2017a-05-18.
- [13]黄群慧. 着力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N]. 光明日报, 2017b-02-07.
- [14]黄群慧. 振兴实体经济要着力推进制造业转型[N]. 经济日报, 2017c-02-10.
- [15]黄群慧. 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J]. 瞭望, 2017d,(31):34-35.
- [16]黄群慧,李芳芳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7][瑞典]简·欧文·詹森. 服务经济学[M]. 罗先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18]江静. 中国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吗[J]. 南京大学学报, 2017,(1):27-36.
- [19]李扬.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辩[J]. 经济研究, 2017,(6):4-16.
- [20]宋建,郑江淮.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2):1-13.
- [21]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2]汤铎铎,张莹. 实体经济低波动与金融去杠杆——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中期报告[J]. 经济学动态, 2017,(8):33-45.
- [23]伍晓鹰. 中国实体经济:创新问题,还是效率问题[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7):62-65.
- [24]亚当·斯密. 国富论(上)[M].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 [25]杨恩艳,马光荣. 中国服务业占比之谜——基于内外经济失衡的解释[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12):22-29.
- [26]张栋,谢志华,王靖雯. 中国僵尸企业及其认定——基于钢铁业上市公司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1):90-117.
- [27]张军. 中国的货币难题[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7):87-98.
- [28]张慧明,蔡银寅. 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1):52-65.
- [29]张晓晶. 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32]Baumol,W.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57(3):415–426.
- [33]Baumol,W. Paradox of Services: Exploding Costs,Persistent Demand[A] Raa, T, and R. Schettkat. *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The Paradox of Exploding Costs and Persistent Demand* [C].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1.
- [34]Hausmann, R., C. A. Hidalgo, S. Bustos, M. Coscia, A. Simoes, and M. A. Yıldırım.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M]. MA: The MIT Press, 2013.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at the New Stage

HUANG Qun-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cademic attention, and in recent years the “off real to fictitious” problem existing in Chinese economy is the major 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 which is addressed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or at the policy level about what the real economy is and the scope of the rea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innovatively a layered framework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first level of the real economy, R_0 , i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real economy, so it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concep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narrow sense. The second level of the real economy, R_1 , including R_0 ,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except manufacturing,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is the concep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general o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 third level of real economy, R_2 , including R_1 ,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transport, storage and postal services, 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services, as well as all other services except the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sectors, is the real economy as a whole, and is the concep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a broad sense. The national economy constructs by R_2 ,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economy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Based on this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growth of three levels of the real econom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finds tha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 economy,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worldwide entity economic power. However, there exists such serious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real economy that manufactur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R_0 , the imbal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R_1 , 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in R_2 . Based 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real econom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trategies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pply system of manufacturing, deepe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and solve manufactur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second is to form harmon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services, resolve the industries structural imbalance, build innovation-driven, efficiency-oriented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 third is to insist “the real economy determinism” under the normal of “sepa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resolv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from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switch the focus of risk prevention from concerning about the ris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o systemic economic risk in the long-term.

Key Words: the real economy; the fictitious economy; classification; structural imbalance; development strategy

JEL Classification: O14 P21 E02

[责任编辑:覃毅]